

中国图书发行史

高信成 著

ZHONGGUOTUSHUFAXINGSHI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国图书发行史

高信成 著

ZHONGGUOTUSHUFAXINGSHI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图书发行史/高信成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309-04792-3

I. 中… II. 高… III. 图书-出版发行-文化史-
中国 IV. 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535 号

中国图书发行史

高信成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江杨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8.75 插页 2

字数 413 千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 100

书号 ISBN 7-309-04792-3/K·169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高信成，大学毕业，原上海新华书店职工中专副校长、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学校副校长、高级讲师、新闻出版署中专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从事书店工作三十八年，1990年退休。先后发表了《关于图书事业发行史的研究》、《商务印书馆发行队伍培训之回顾》、《我国宋代的图书发行事业》、《中国图书发行宣传的产生与发展》等论文、专著若干种。

内 容 提 要

作为新闻出版专业的基础教材，本书以浓缩的笔墨对中国图书的出版发行史略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描述。全书共分三编，自西汉初年到新中国成立，跨时两千余载，逐一记述各个时期各类书肆、书坊、书店的发生、发展、繁荣、衰落的境况，并具体介绍了相关出版物在发行方法和发行网点上的特点及其效果，从而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图书发行工作的地位、功能和规律。本书内容翔实，材料丰富，文字浅易，较适合全国中等、高等院校出版专业的教学所需，亦可供广大从事图书出版与发行工作的从业人员们参考使用。

目 录

绪论 关于中国图书发行史的一些思考	姚福申 1
-------------------------	-------

第一编 中国古代图书发行史

概述	11
第一章 两汉时期的图书发行	15
第一节 早期的书籍传播和流通	16
第二节 书肆的诞生	20
第三节 东汉时期的图书发行	22
第四节 图书发行产生于汉代的历史原因	23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发行业	25
第一节 纸书的出现	25
第二节 抄书的风行与佣书业的发展	27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发行业	29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图书发行业	31
第一节 抄本书的盛行	32
第二节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唐代的图书发行业	33

第三节 五代时官府、私人刻售书籍的出现	41
第四章 宋代的图书发行业	44
第一节 官营图书发行业的发展	45
第二节 坊肆售书业的新发展	50
第三节 宋代书籍的盛销北方、海外	61
第四节 辽金西夏的图书发行业	62
第五节 宋代图书发行业兴盛的原因	65
第五章 元代的图书发行业	68
第一节 官府刻印书籍颇具规模	68
第二节 书坊营业相当繁荣	71
第三节 印刷技术上的突出成就	74
第六章 明代的图书发行业	75
第一节 官刻之风极盛	77
第二节 书坊数量激增	80
第三节 图书贩运业的兴盛	85
第四节 书坊销售形式众多	86
第五节 出版发行出现专业分工	88
第六节 明代图书发行业繁荣的原因	90
第七章 清代的图书发行业	92
第一节 官府刻印书籍空前盛行	93
第二节 书肆业的繁荣	95
第三节 书坊街和书摊区	98
第四节 民营书坊发行方法的新改进	101
第五节 租书业的兴起	103
第六节 清代的书禁	106

第二编 中国近代图书发行史

概述	111
第一章 太平天国革命书籍的宣传	116
第一节 太平天国刊行革命书籍经过	117
第二节 太平天国印书的流通去向	121
第三节 重视书籍印行工作的历史经验	123
第二章 清末封建官营书局的图书发行工作	128
第一节 各省官书局的建立与发展概况	128
第二节 官书局的发行工作	136
第三节 官书局的历史作用	142
第三章 近代外国在华出版机构的发行工作	144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出版机构发行工作简况	145
第二节 基督教传教士在华推销《圣经》的活动	169
第三节 近代外资出版机构发行工作的历史功过	174
第四章 维新派的图书宣传活动	186
第一节 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	187
第二节 维新派创办的书局	188
第三节 维新运动后中国出版发行行业的新面貌	193
第五章 辛亥革命派的图书宣传活动	196
第一节 辛亥革命派图书宣传活动概况	197
第二节 清政府对革命书刊宣传的镇压	204
第三节 辛亥革命图书宣传的历史经验	206
第六章 近代中国民营书业的发行工作	210
第一节 近代前期民营书业的发行工作	211
第二节 近代后期民营书业的发行工作	222
第三节 近代中国民营图书发行行业的特点	236

第三编 中国现代图书发行史

概述	249
第一章 五四运动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图书发行业(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出版发行业的兴起	258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夕的革命书店	259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革命书店	270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图书发行业	281
第四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出版发行活动	290
第五节 专制统治下的图书查禁与反查禁斗争	303
第二章 五四运动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图书发行业(下)	
——国民党政府官营书业的建立与民营图书发行业的发展	309
第一节 国民党政府官营出版发行机构的建立	310
第二节 中小型民营书店大批涌现	314
第三节 大型综合性新书店的进一步发展	319
第四节 民营图书发行业的特点	337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图书发行业	345
第一节 官营和民营的图书发行业	346
第二节 生活、读书、新知书店	362
第三节 国民党的文化统治及出版界的反迫害斗争	372
第四节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图书发行业	377
第五节 日伪占领区图书发行战线的斗争	400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图书发行业	409
第一节 新华书店在斗争中成长	410
第二节 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在国统区的艰苦奋斗	419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民营图书发行业	426

第四节 反迫害斗争与国民党官办书店的没落	433
第五节 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召开	442
后记	451

绪论

关于中国图书发行史的一些思考

“图书”一词,早在二千一百多年前就在我国古籍中出现,《史记·萧相国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备秦图书也。

不过司马迁在这儿所说的“图书”,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图书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史记》中的“图书”,指的是秦朝政府保存的档案图籍,其中包括各地关隘、要塞的地形图,全国的户籍资料和地方政府关于民生情况的报告等。今天我们所说的图书,实际上是专指以传播文化知识为目的公开发行的书籍和图片,并不包括政府机关的公文书和各类档案材料。

由于中国最初的文字手段仅仅掌握在极少数高级贵族手中,所以应用的范围非常狭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使用于历史档案、占卜记录、青铜器与玉石上的铭文以及各种契约文书,并未出现以传播文化知识

为主要功能的一般书籍。直到西周晚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情况的复杂化,执政者感到需要有一批具有文化知识素养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士”,来充当自己在经济管理和行政事务中的助手。于是一向为高层统治者所垄断的文字工具,不得不向“士”这一社会阶层作一定程度的开放。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至前782年)的史官籀,便是首先将镌刻在甲骨、青铜器上的文字移写到竹简上去的人。他是“大篆”这一字体的创造者,并且为蒙童编写过中国最早的识字课本《史籀篇》。到了东周前期,私人讲学之风盛行,教育“士”的大师孔子,开风气之先将原本收藏于史官处的历史档案,按文献的不同性质编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统称为“六经”,用来作为向学生们传授知识的教材。《史籀篇》、“六经”等教科书便成了我国最早出现的书籍。为了与档案图籍相区别,时人便将此类教学用书称为“经籍”。

书籍与档案(或称作“非正式书籍”)在性质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档案由官府保存,仅面向执政者和少数高级贵族,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缅怀先人的光辉业绩并向其后裔传授统治经验,一般情况下秘不示人。书籍则以图文形式面向广大读者,其目的是传播文化知识,允许公开流通。因此书籍的需求量很大,它必须通过各种方法多次复制来满足社会上的普遍需要。古代书籍复制的手段主要为手抄,纸张发明以后,开始出现传拓,进而发展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当复本积聚较多,超越了本人自己需要时,就会产生互通有无的书籍交流活动,进一步发展为书籍在市场上的交易。我们把批量图书在市场上的交易行为称之为图书的发行工作。

为了清楚地阐述二千多年来中国图书发行活动产生与发展过程,有必要弄明白“图书发行”这一概念,并对此作出明确的科学界定。各类辞书对“发行”一词有多种解释,现择要综述如下:

“发行”有两种读法,读作发行(hang)时,指的是批发的意思;念作发行(xing)时,是指发出新印刷的货币、公债或新出版的书刊。

在出版工作中,发行泛指图书、报刊、画片等出版物的流通阶段,即经过销售、分配等各种渠道和方式将出版物分发给读者。

辞书的解释总是着眼于现状,因此将图书视为出版物,即印刷品,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自西周晚期至唐代中叶这一千多年间,图书全是用手抄来复制的,所以就历史的视野来对“图书发行”作界定的话,就不宜将图书视为清一色的出版物。据此我们认为“图书发行”的定义应该是:

通过销售、预订、交换、赠阅等方式,将载有图文的批量书籍(手抄件或出版物)交付给广大读者的社会性流通过程。

从对“图书发行”概念的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是从属于出版事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整个出版活动中起着将图书推向社会的文化传播作用。图书发行是一种工作,当社会上有一批人专职从事这项工作并以此谋生时,它就成了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业。中国图书发行活动有其自身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探索和研究这段历史过程,便是中国图书发行史这一学科的任务。

图书发行活动进而演变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既然有它的产生与演进的过程,就应该有其内在规律可寻,这不是史学研究者的一大课题。图书发行业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它的繁荣与萧条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息息相关。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演进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图书发行业的经营规模和发展现状。倘若进一步作具体分析,图书发行活动的产生,乃至行业的形成与发展,显然取决于生产图书的物质材料的演进、图书复制手段的进步、图书生产总量的增长和书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除了上述经济因素外,同时也受民众总体文化水平、政治管理体制与执政者开明程度等政治、文化因素的制约。

当书籍尚处于简策时代,即使号称学富五车的学者,其藏书充其量不过数百卷。由于社会上图书的总量不多,除了个别人可能在特定的时间与场合偶尔进行图书交易外,仅在知识分子特别集中的长安、洛阳等政治

中心才会出现规模不大的书肆,此时的图书发行活动尚处于萌芽时期。到了纸书盛行的唐代,书籍的复制变得较为容易,此时藏书家所收藏的卷轴已数以万计,而且书分四部品种繁多。此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从事书籍复制的庞大抄书人群体,于是长安、洛阳、扬州、越州、苏州、江西、益州、淮南等处都成了著名的书籍集散地。虽然印刷术出现于唐代中后期,但刻印技术尚未过关,出版物字迹漫漶,“浸染不可尽晓”,只能印些不为社会重视的占梦、相宅、杂记之类通俗读物。直到宋朝统一全国后,统治者强调文治,到了宋真宗景德年间,雕版印刷业有了迅猛的发展。由于复制技术进步迅速,书籍出版变得十分便捷,社会上图书数量激增,发行业随之出现了飞跃发展的态势。不仅大城市内书铺林立,而且出现了闻名全国的书商和由宋延续至明历时数百年的老字号书铺。由于书籍全成了出版物,图书的制作与销售有了分工,图书的集散中心并不就是印刷出版中心。开封、杭州、建阳、重庆是宋代四大出版中心,因为开封、杭州、重庆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大城市,所以又是图书发行中心。建阳因盛产竹纸,印书成本较低,该地麻沙、崇化两镇居民大多以刻书为业,而当地自行消费的书籍数量有限,绝大部分都运往外地销售,与开封、杭州等地书铺以自产自销为主的情况迥异。这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工场与店铺分离,图书发行业市场化程度提高的一个表征。

元朝处于文化落后的蒙古族统治之下,就经济与政治状况而言,均不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但在元朝统治的百余年间,图书的排印技术、套印技术和活字印刷技术等方面还是有明显的改进,图书发行业在规模上仍有所发展。到了明代,书籍的印刷基地和集散中心有了更加明确的分工。北京、南京、杭州、苏州,由于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文人荟萃,成了全国图书的主要集散地。而福建的建安、江苏的常州、安徽的徽州和浙江的湖州因生产纸墨,便于就地取材,则成了书籍的印刷出版基地。于是出现了专事远地贩运转手出售的书商,图书发行业在商业化程度上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尽管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书商经济效益的增长,却并不意味着图书质量必然相应随之提升。以追求赢利为目的的书坊刻本,往往纸墨不精、校讎草率,倒是保持编、印、发一条龙经营的毛晋汲古

阁、胡勉学师古斋等少数出版机构,有饱学之士认真负责地主持其事,主要着眼于文化的传承,在书籍质量上长期保持领先的地位。

虽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总的来看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图书发行活动的运作规模与繁荣程度,然而在一段特定时期内,政治因素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近现代中国图书发行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近现代正处于非常时期,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显得特别尖锐,重大政治事件频繁发生的缘故。

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消极影响十分深远。然而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带来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现代出版发行机构的新模式,使中国出版业和图书发行业在运作规模和经营方式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并扩大鸦片战争后在华的既得利益,利用宗教手段和奴化思想来影响中国人民,创办了许多教会书局。然而这些书局出版发行的书籍,却为西学东渐开辟了一条通道。可见政治因素对图书发行业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

道光咸丰年间,内有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外有英法联军的人侵,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北京、天津一带的图书发行业遭到严重破坏。然而,就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不久,清政府为了恢复遭到革命冲击的旧秩序,在各地建立了许多官书局,宣扬传统的封建文化,企图借此维护其专制统治,于是一时间图书发行业又显得活跃起来。

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勃兴,同样有其政治原因。在维新变法运动推动下的西方书籍译介工作、废除科举制度后对新型教科书的大量需要、辛亥革命后民主自由思潮的掀起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等等因素,无不对民营出版业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中国第一流出版机构都在这段时期内快速崛起,绝非偶然,政治因素所带来的机遇无疑是重要的原因。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更是有力地推动了进步出版业的迅速成长,其影响尤为深远,对中国的图书发行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样会给中国出版业带来一次又一次灾难,这种影响立竿见影地反映在发行业的大萧条上。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和蒋介石的

背叛革命,使全国出版业和发行业,特别是革命报刊与进步书籍遭到严重的摧残,一些发行工作者更是惨遭杀身之祸。日本的侵华战争将占全国图书发行量三分之二份额的上海、历代故都北京、全国政治中心南京、经济中心天津与武汉等大城市沦为文化荒漠,倒是原本居于第二、三流的城市,如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金华、永安、邵阳、延安等地,变成了战时文化中心。这种文化错位现象,恰恰证明了政治因素足以在特定时期内对图书发行业的盛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经济毕竟是经常起作用的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而政治则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政治原因对图书发行业所造成的影响虽然有时很严重,甚至是压倒一切的,但为时短暂。抗战结束后,上海、南京、北京等经济相对发达、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很快恢复了它固有的地位。这便是中国图书发行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政治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文教政策的是否得当,都可以在图书发行的业绩上得到印证。建国后,因国民党政权垮台而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图书出版业,在人民政府扶植下逐年得到恢复。1956年时,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对他们的进步作了充分肯定。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国人民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声中意气风发地工作与学习。当年全国图书销售量较上一年骤增48.2%,达到历年来的最高水平14.78亿册,库存量降至建国以来的最低1.76亿册,比上一年下降246.2%。然而很快就因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关系,1957年的发行业绩大大地下降,全国图书销售量减少了12.2%,为12.97亿册。经过多年的调整,“大跃进”的负面影响逐步消除,图书销售量也由1961年的11.91亿册攀升到1966年的35.77亿册。可是“文革”开始后,图书销售业绩又逐年下滑,到1972年降至七年来的最低点19.94亿册,而库存却达到28亿册。1969年时库存曾达到过41.29亿册,创建国以来的历史记录。事实上“文革”期间售出的图书中,毛主席的各类著作占了极高的比例,图书发行的实际品种下降得更为惊人。据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版)的统

计：“‘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年，图书出版从上年的 2.0143 万种，骤降到 1.1055 万种，减少将近一半。到了第二年，又猛降到 2925 种，只有上一年的 26.4%。其后几年，始终徘徊在三四千种左右。”拨乱反正后，新华书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书刊品种少的情况很快得到改变，全国图书发行量持续八年攀升。虽然我们不能将图书发行量简单地视为国家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因为它毕竟还涉及纸价、物价、国民收入增长指数等诸多因素，但图书发行业绩无疑与政治景气度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图书发行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近期的销售热点和发行业绩显示了当前人们的一种文化心态，可见发行学应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近年来，出版学和编辑学方面的著作频频问世，而有关发行方面的论著却显得颇为冷落，不免令人遗憾。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高信成先生《中国图书发行史》的出版，它开创了发行史研究的先河。该书条理清晰，分析精当，史料详实，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各个时期图书发行活动的历史画卷。书中穿插着近现代学者、革命家关于发行工作性质、意义、任务、方法的一些论述，也讲述了民营出版社与外资出版社对门市服务工作的重视和图书经营策略、销售方法上的创新，不仅丰富了图书发行史的内容，而且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行学也颇有借鉴意义，值得研究者重视。

高信成先生是上海出版界的耆宿，曾担任上海新华书店职工中专副校长、高级讲师。本人应复旦大学出版社高若海总编辑与本书责任编辑宋文涛博士之邀，为《中国图书发行史》撰写绪论，深感荣幸。我理解编辑部的意思是要为该书撰写一篇导言性质的文章，便于读者更好地解读这部篇幅宏伟的巨著。虽然本意很明确，但限于自身的学识，能否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尚在未知之数。倘能宽容地取得编者、作者与读者的认可，那就真的要额手称庆了。

姚福申

2005 年 10 月 15 日